

史部史鈔類的發展與標準 —以《四庫全書總目》為核心**

劉德明*

摘要

中國傳統的目錄書籍不只是記載書籍名稱，它在做書籍分類的同時亦有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四庫全書總目》則是中國目錄書籍中的集大成之作。本文以「史鈔」類為主題，討論此類在歷史中的形成過程及《四庫全書總目》對此類書籍的看法與標準。本文一方面以歷史溯源的方式來探究「史鈔」類形成過程，另一方面則就《四庫全書總目》對於各史鈔書籍的評斷做一整理，論述四庫館臣對於史鈔的各種批評。進而討論《四庫全書總目》為何對史鈔類書籍評價較低的原因及理由，並從中看出其分類的標準為何，並反省其缺點。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目錄分類、史鈔、史評

國立中興大學 

** 審查過程中承蒙匿名審查教授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史部史鈔類的發展

中國以目錄方式著錄當時現存書籍的起源很早，至少在西漢末年時的劉向、劉歆父子即有《七略》一書。《漢書》中有言：「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¹可見在東漢的班固即已把劉向關於圖書編目的文章叫做目錄了。²由此之後，歷代均有關於目錄編述的著作。這些著錄各種圖書的目錄書籍，或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對於編目的目的在於「考見學術之源流」的宗旨則無異議。³在這漫長的目錄書籍發展過程中，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成常被視為是中國傳統目錄書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四庫全書》從清乾隆 38 年(1773)高宗皇帝下令成立四庫館開始，至乾隆 46 年(1781)第一部《四庫全書》抄寫完成，以皇家之力耗費多年方才完成此收書三千四百多種的巨大工程。《四庫全書》在初期進行採編之時，安徽學政朱筠即主張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亦應編撰一部《四庫全書》的目錄提要。朱筠的提議後為乾隆皇帝所接受，所以在編纂《四庫全書》之時，亦同時進行撰寫《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⁴《總目》內容共 200 卷，除了《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圖書之外，也旁及未收錄進《四庫全書》的書籍：不但載明書名、卷數、作者、版本亦同時評述其書籍內容。《總目》不僅是《四庫全書》的書目提要，它同時也代表《總目》作者對學術源流及各種書籍的評價等等看法。事實上，若就學術史的研究而言，《總目》因為代表著四庫館臣的看法，似

¹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敘傳第七十下〉，《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100 下，頁 4244。

² 姚名達：《目錄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6。但張舜徽則認為：「以此名學，則實始於宋人」見是氏著：《廣校讎略》(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2。兩者之說乍看之下似乎不同，但此爭議多是關於「目錄學」之內容界定問題，對中國有「圖書目錄」之時代則沒有什麼差別。

³ 余嘉錫將目錄之書分為三類：「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有小序而無解題者」及「小序解題並無，祇著書名者」。余氏認為這三類的編目宗旨無異。見是氏著：《目錄學發微》(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2。

⁴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之編纂過程，請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 209-211。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頁 110-112。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3。本文所引《四庫全書總目》內文，均採用(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乎較《四庫全書》更具有研究價值。⁵目錄書中對典籍的著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即是透過分類將「繁雜的書籍編成簡明的目錄」，⁶進一步能使讀者透過這個目錄來研究學問。依照這種看法，《總目》在分類目錄上的價值與意義更是被常常提及，如司馬朝軍即說：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具有嚴格意義的分類學，但書目分類體系自古就很健全，至《總目》時已達至頂峰。⁷

《總目》可以說是傳統目錄書籍在分類上最精細也最完整的代表。所以本文擬以《總目》為核心，討論史部史鈔類在歷史上的發展，並由《總目》對「史鈔」類的評價中，看出《總目》及歷史上各目錄典籍對史鈔的不同分類標準。

在最早的目錄專書《七略》、《別錄》中並無「史部」此部，余嘉錫言：「史書本附《春秋》，《中經簿》始自六藝內析出。」⁸也就是說史部典籍原由「春秋」類中發展而出。剛開始時史類作品不多，之後則各類史學著作日益繁盛，於是史類作品下又逐漸分出各個不同的小類。(梁)阮孝緒作《七錄》首先將大類下更細緻的分出不同的小類，以概念上約為後世之史部的《紀傳錄》為例，其下分為十二小類：國史部、注曆部、舊事部、職官部、儀典部、法制部、偽史部、雜傳部、鬼神部、土地部、譜狀部、簿錄部。⁹阮孝緒的做法影響很大，在日後小類名稱或隨著不同的目錄書籍而有不同的名稱與分法，但大多具有阮孝緒的兩層分類的概念。

在史部的小類中，「史鈔」一類的出現頗晚。雖然《總目》將「史鈔類」的源流上溯至孔子：「帝魁以後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取百篇。此史鈔之祖也。」¹⁰四庫館臣似將《尚書》視為最早的「史鈔」。但這種說法至少有兩

⁵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4期。

⁶ 姚名達：《目錄學》，頁11。

⁷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頁143。一般學者大約是在目錄學中包含分類學，而司馬朝軍則是把分類學與目錄學分別言之，其亦從目錄學的角度認為《總目》是「中國傳統目錄學的集大成之作」。見是氏書，頁182。

⁸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頁137。

⁹ (梁)阮孝緒：〈七錄序〉，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初編，1922)，卷3，頁7。

¹⁰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65，〈史鈔類〉，頁1761。

個問題：第一是《尚書》的來源問題。第二則是《尚書》是否曾被目為史鈔？《尚書》源於帝魁之說出於《書緯》，《書緯》中記：

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¹¹

但是此說相當可疑，因為《書緯》此說至漢代方才出現，並沒有其他文獻的支持，所以錢穆即言《書緯》之說：「無徵於《論語》，無徵于《孟》、《荀》，秦火以前，無此說也。」¹²而且四庫館臣對於緯書的看法是：「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¹³顯然四庫館臣本身對於緯書亦不完全相信，四庫館臣亦沒有提出其對《書緯》此說「審別其是非」的理據。至於第二個《尚書》是否屬於「史鈔」的問題，其實除《總目》外，亦罕有學者主張《尚書》為「史鈔」或「史鈔之祖」，因為現有典籍中出現「史鈔」的正式記錄是晚至宋朝才出現的。

一般普遍認為在現存典籍中，《宋史·藝文志》是最早設立「史鈔」一類，但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¹⁴因為《宋史·藝文志》的內容是參考宋時所修的《國史藝文志》及《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而成，¹⁵《宋史·藝文志》即言：

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為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復，合為一志。¹⁶

所以實際上「史鈔」在史部下成為獨立一小類的時間極有可能較《宋史》更早。

現在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說宋朝所修的四部國史中即有「史鈔」一類，但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中有引述晁公武(1105-1180)之言：

¹¹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尚書緯》，收入《緯書集成》（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 390-391。

¹² 錢穆：《國學概論》（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冊 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 16。

¹³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19，《周禮注疏》提要，頁 503。

¹⁴ 見張永瑾、張史俠：〈史部類目淵源商榷〉，《文獻季刊》1999 年 7 月第 3 期，頁 184-185。

¹⁵ 此說可參見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頁 117。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174-175。

¹⁶ (元)脫脫撰：《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卷 202，頁 5033-5034。

前世史部中有史抄類，而集部中有文史類，今世抄節之學不行而論說者為多。故自文史類摘出論史者為史評，附史部，而廢史抄云。¹⁷

依此說法，「史鈔」一類並非是到了元代時的《宋史》所獨創，而是在宋初時即成立了。進一步來看，在現存典籍中，張富祥發現了《玉海》中記宋初杜鎬所撰《龍圖閣書目》中的史傳類即有「史抄」一小類。¹⁸李瑞良又論及南宋高似孫在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所作的《史略》中亦有「史鈔」一類。¹⁹在《史略》卷4中有「史典」、「史表」、「史略」、「史鈔」、「史評」、「史贊」、「史草」、「史例」、「史目」、「通史」、「通鑑」、「通鑑參據書」等不同的小類。高似孫在「史鈔」類中錄有葛洪《史記鈔》、葛洪《漢書鈔》、葛洪《後漢書鈔》、《吳志鈔》、張緬《晉書鈔》、《三十國春秋鈔》及《九州春秋鈔》等7部史鈔典籍。高似孫並說：「言鈔者，皆擷其英、獵其奇也，可為觀書之法也。」²⁰以高似孫這樣的描述來看，史鈔(或其他類部之鈔節)之書實是一種行之久遠令人得以快速了解大部圖書內容的方法。我們在(南宋)徐元杰於理宗景定二年(1261)所刊行的《榘堊集》中也發現有類似的說法：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其書愈多，而讀之者愈不能遍，於是讀史有捷徑，曰史類、曰史抄。²¹

由以上種種的文獻顯示，早在前南宋之前，即已出現許多史鈔類的書籍，用以幫助初學者快速的了解史實，而其命名亦多有直接以某某史鈔為名。也因為如此，所以在有些目錄書籍裡，「史鈔」類的書籍也就被視為史部下的一個獨立小

¹⁷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00，〈劉氏史通〉頁17。幾乎同樣的文字亦見(宋)王應麟：《玉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9，〈唐史通析微〉，頁24。此段文字僅見於衢本的《郡齋讀書志》，而袁本《郡齋讀書志》中並沒有這段文字。見(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95。

¹⁸ 張富祥：《宋代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57。《玉海》對此的記載見《玉海》，卷52，〈祥符龍圖閣四部書〉，頁42。

¹⁹ 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頁226。

²⁰ (宋)高似孫：《史略》(光緒十年(清)黎庶昌校刊《古逸叢書》本)，卷4，頁4。

²¹ (宋)徐元杰：《榘堊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0，〈題聖宋蒙求後〉，頁15。

類。之後知名學者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時，亦在史部下設立了「史評史鈔」類，李瑞良說：

(馬端臨《文獻通考》)分類體系大體上斟酌於新舊《唐志》和《崇文總目》之間……史部與《新唐志》、《崇文總目》相近，增加《史評史鈔》類。²²

對比馬端臨與高似孫的做法，雖然就分類標準來看馬端臨將「史評」、「史鈔」合一的做法較為簡略，但就實際現實而言或許更為合理。因為高似孫雖有列「史評」一類，但在此類中僅著錄王濤《三國志序評》與徐爰《三國志評》兩書，以分類的觀點來看，高似孫將「史評」「史鈔」分立的分類方式未免過於瑣碎。²³

在馬端臨之後，《宋史·藝文志》則在史部中設有「史鈔」一類，而沒有「史評」。姚名達言：

晁《志》之史評，尤《目》之史學，有似馬《志》之史評史鈔(合一類)。及《宋志》、《明志》之史鈔，而《四庫》始析為史評、史鈔二類。²⁴

陳莉玲、王子彥亦說：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將史評、史鈔合為一類，稱「史評史鈔類」……《宋史·藝文志》始將史鈔類獨立出來。史鈔類是史書分類名

²² 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頁 187。

²³ 事實上，高似孫《史略》的收書亦有其限制，最明顯的是其「史評」類中並沒有收(唐)劉知幾的《史通》一書。此外，最早在史部下獨立出「史評」類的應是晁公武，孫猛指出在晁公武之前的目錄書籍往往將史評與文學批評之書相混，「獨公武於史部設史評，又於衢本集部設文說，文史批評著述遂得所歸，故後世眾目多宗焉。」見(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注 3，頁 296。潘美月言晁氏書之分類「大抵依據崇文總目，惟經部增經解，史部增史評而刪去歲時。」見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159。

²⁴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頁 102。

目之一，《宋史·藝文志》之後，《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因之，也有史鈔類。²⁵

陳、王二人所述大體是依循姚名達之言，但其中存在著一個容易令人產生誤會的小問題：那就是《宋史·藝文志》並非是將史鈔「獨立」出來，精確的說應是《宋史·藝文志》用「史鈔」類取代了《文獻通考》中的「史評史鈔類」，因為在《宋史·藝文志》史部中並沒有與「史評」類相同或性質相近的小類。之後《明史》亦依循《宋史》的分類方式，僅有「史鈔」類而沒有「史評」類。這種情形到了《總目》時才有了改變。就名目上來看，《總目》的確是在《史略》之後，又一次的採取將「史鈔」與「史評」兩者分開，採用使其分別獨立成類的分類方式。但我們亦可以在《史略》與《總目》之間找到有其他學者採取與其類似的分類方式，這就是清朝黃虞稷(1629-1691)的《千頃堂書目》。在《千頃堂書目》中雖亦只有「史抄」類，而沒有「史評」類，但其另立有「史學」一類，觀察「史學」類所收錄書籍內容實近於《總目》的「史評」類。²⁶若以實質而言，《千頃堂書目》較《總目》更早將「史鈔」「史評」兩類典籍區分開來；但就名目而言，則是《總目》沿用《文獻通考》(甚至是《史略》)的名稱，並確定用以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種類的典籍。

二、《總目》所收錄史鈔類典籍及其評價

《總目》所收錄「史鈔」類的圖書極少，正式收錄的書籍僅有四部，而存目亦僅止有四十部。《總目》將史鈔類圖書分為兩種：一是「專鈔一史」：如葛洪的《漢書鈔》及張緬的《晉書鈔》之類，分別是專以《漢書》、《晉書》為主

²⁵ 陳荊玲、王子彥：〈宋代文獻概述〉，收入：周彥文主編：《中國文獻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248。

²⁶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頁35。黃虞稷為此類目命名為「史學」，應是受到(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的影響，因為在《遂初堂書目》中即有「史學」類而沒有「史評」。順帶一提的是《遂初堂書目》一書亦有學者認為除「經總」與「正史」兩類書目「是尤袤手定外，其他各類則是在尤袤指導下由家人照架抄錄而成的。」見張雷：〈尤袤《遂初堂書目》的再認識〉，收入周彥文主編：《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383。

的鈔錄。第二種則是「合鈔眾史」：如阮孝緒《正史削繁》，其鈔錄內容來源並不止於單一史書。依四庫館臣所述「專鈔一史」的史鈔書籍在宋朝以後的發展並不興盛，而「合鈔眾史」式的史鈔則日益繁多。所以《總目》又將「合鈔眾史」式的史鈔細分為四類：一是如《通鑑總類》之類，其內容為「離析而編纂之」式的史鈔。二是如《十七史詳節》之類，其內容為「簡汰而刊削之」式的史鈔。三則是如《史漢精語》之類，為「採摭文句而存之」式的史鈔。四是如《兩漢博聞》之類，為「割裂詞藻而次之」式的史鈔。²⁷嚴格來看，《總目》將史鈔分為「專鈔一史」與「合鈔眾史」兩類，再將「合鈔眾史」分為四類的作法，是混淆了兩個不同層次的標準。因為前者主要從鈔寫的來源為判別標準，而後者則是以對原文的處理方式為其分類標準。

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之中，僅收《通鑑總類》、《兩漢博聞》及《南史識小錄》及《北史識小錄》四書。其中《南史識小錄》及《北史識小錄》性質又近於《兩漢博聞》。現依《總目》內容，先分別簡介《總目》對此四書的評價。再分類論述《總目》對列為「存目」之書的批評。

《兩漢博聞》一書本不著撰人名氏。《總目》提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記載，此書為宋楊侃所編。²⁸本書名為「兩漢」，所以主要以前後《漢書》為鈔錄範圍，但其在內容編排上「不依篇第，不分門類」，僅「簡擇其字句故事列為標目」。雖然四庫館臣對此書之為評語為：「雖於史學無關，然較他類書採摭雜說者，究為雅馴。」並認為其內容有些可以補足前人之遺漏，「則亦非無資考證者矣。」但亦指出本書有「體例未免少疏」、「至所列紀傳篇目，亦往往多有訛舛。」兩個缺點。²⁹至於《南史識小錄》及《北史識小錄》兩書都是清朝沈名蓀、朱昆田兩人共同鈔編成書的。這兩書都是模仿《兩漢博聞》之例，其素材主要取自《南》、《北》二史，鈔摘其鮮華字句與新異事蹟，摘錄成編。此二書在體制上既與《兩漢博聞》相類，所以其內容亦不分門目，依照原書次第加以臚列，僅各著其篇名，也沒有對內容加以訓釋，只是用數字標目，然後將原

²⁷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頁 1761。

²⁸ 據胡玉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上海書局出版社，1998)中引瞿鏞之考證，云四庫館臣所見此書亦非楊侃當時所編之全本，已經過胡元質所刪削。見胡氏是書，頁 526。又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263-264。

²⁹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頁 1761-1762。

文鈔載於其下，最多著明所鈔錄之語的來源而已。《總目》認為此二書體例相類，但與其他典籍相較又有許多特點與不同之處：

然揆以史體，固曰稍乖，至於賦手取材，詩人隸事，則樵蘇漁獵，捃拾靡窮。此譬如柎瘤為病，而製枕者反貴其文理也。名孫等擷其精華，以備選用，使遺文瑣事，披卷燦然。其書雖作自近人，其所採錄則皆唐以前事，與《藝文類聚》諸書約略相似。存以備考，愈於冗雜之類書多矣。

30

此段文字雖是針對《南史識小錄》及《北史識小錄》兩書，但因《兩漢博聞》之體例相似，所以亦可視為對此類書籍的總評。四庫館臣之意主要有三：一是這類的史鈔與傳統史書有別，尤其是此類史鈔所重視的部份與傳統史書往往並不相同。二則是此類書籍所摘取文字多「雅馴」、「披卷燦然」，這反近於以內容是否具有文學性為標準而不是以記實與否的史學為標準。三則是此類書籍雖擷取史籍中之文字，但較類書全面性的擷取分類又來得更為精要。

至於《通鑑總類》一書則與前三書不同，此書為宋朝沈樞所撰，其主要由《資治通鑑》中所記的事蹟鈔錄出來的，但其又仿類書《冊府元龜》的編排方式。《通鑑總類》全書共分為二百七十一門，而且「每門各以事標題，略依時代前後為次，亦間採光議論附之。」也就是說《通鑑總類》與《兩漢博聞》等三書在內容安排上是有極大的不同，《通鑑總類》將《資治通鑑》內容做了重新安排，加以分門別類的鈔錄，依此做法則此書性質近於類書。但是四庫館臣認為這正是此書的缺點，《總目》批評《通鑑總類》的分類太過於繁瑣，其言：

所分門目，頗有繁碎。如賞罰門外又立貶責、功賞二門，外戚門外又立貴戚一門、東周下迄五代，興廢不一，乃獨取「申徹論燕必亡」，「黃泓論燕必復」二條，立為興廢一門，則疏漏太甚。³¹

不論是「貶責」或是「功賞」本亦應歸入「賞罰」一類，而且有了「外戚」一類又何必立「貴戚」一類？持平而論，若是沈樞將此分類方式以兩層的分法來

³⁰ 上文關於《南史識小錄》及《北史識小錄》之引文具見：(清)紀昀總纂：《總目》，卷65，〈史鈔類〉，頁1763。

³¹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65，〈史鈔類〉，頁1762。

做歸類處理，亦可見其分類的細緻。但若僅是平列而分，則四庫館臣所批評的缺點，確實有理。雖然如此，《總目》亦認為此書有一定的價值，其言：

司馬光嘗言惟王勝之曾讀一過，餘人不能數卷即已倦睡。則採摭精華，區分事類，使考古者易於檢尋，其書雖陋亦不妨過而存之也。³²

《資治通鑑》雖然為史學名著，但其共二百九十四卷的繁浩內容亦令人生畏，司馬光就說只有王勝曾將全書讀過一遍，其他人則是讀了幾卷後便即昏昏欲睡。《通鑑總類》一書的優點即在此呈現，因其將《資治通鑑》內容重新的分類編排，讓讀者易於找到其所需要的史料。³³所以四庫館臣雖然認為其書之分類未必精當，但亦有一定的價值，這或是史鈔最重要的價值。

《總目》所採錄史鈔之書，多將列為「存目」，其中亦不乏有鼎鼎大名的作者：如洪邁之《史記法語》與《南朝史精語》、呂祖謙之《十七史詳節》與《東漢精華》、唐順之《史纂左編》、茅坤《史記鈔》等人與著作。若從數量來看，史鈔類存目之作者以明儒居多，共有 31 部，占 3/4 強。這些史鈔作品，四庫館臣不將其收入四庫全書之中，而僅將其列為存目，歸納起來大約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作者鈔節史書時其志本非為著書，僅是做為其個人日後論著所準備之資料而已。四庫館臣在洪邁之《南朝史精語》的提要言：

蓋南宋最重詞科，士大夫多節錄古書，以備遺用……巾箱秘本，本非著書，不幸而為人所傳者，則有如此類。後人以其名重存之，實非其志也。以流傳已久，姑存其目，實則無可采錄。³⁴

又於呂祖謙之《東漢精華》提要言：

³²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頁 1762。

³³ 根據胡玉縉的考訂，《總目》對《通鑑總類》的好評有一個原因是基於樓鑰與周伯琦對此書的推崇，但胡玉縉認為樓、周兩人的推崇都是基於朋友人情，故云：「《提要》云云，殊無聊。」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頁 526。

³⁴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5。

是書乃閱史之時摘錄於冊，以備文章議論之用。後人重祖謙之名，因而刊之。與洪邁《經史法語》均非有意著書者也。³⁵

不論是《南朝史精語》或《東漢精華》都是作者平日閱讀各種史籍時所記下的條目，本或為應試及著書之用，無意將此公開示諸眾人。但後人因作者之名聲，所以將其私人平日讀史所鈔錄的資料加以刊行，這本來就並不是作者的初衷，更不用說其內容在抄錄時未必具有條理或有值得他人參閱的價值。在存目之中此類書籍不少，除前文所提之書外，尚有宋朝錢端禮的《諸史提要》，亦是因其本人寫作文章需要而成集，其內容更無可取。³⁶

二、所鈔錄之內容太過冗雜：如呂祖謙著有《十七史詳節》一書，《總目》言：

所錄大抵隨時節抄，不必盡出精要。如《東漢》、《晉》二史內，四言贊語，於本書已屬贅拇駢枝，乃一概摘存，殊為冗雜。……祖謙雖亦從事於講學，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喪志之說，以文飾空疏。故朱子稱其史學分外仔細。附存其目，俾儒者知前人讀書，必貫徹首尾。即所刪節之本，而用功之深至，可以概見。³⁷

呂祖謙之為學方式與宋朝道學家有別，其對於「學」尤其是史籍特別重視，連朱熹都稱贊其「分外仔細」。³⁸但是四庫館臣對其《十七史詳節》一書則認為是書摘存失當，對於原書中即屬多餘的「四言贊語」，呂祖謙又將之鈔錄至《十七史詳節》中，四庫館臣認為尤不合適。

三、所鈔內容漫無次序、毫無體例可言：四庫館臣以此理由批評的史鈔類書籍頗多，如(宋)林越所撰之《漢雋》一書，《總目》言其：「割裂字句，漫無

³⁵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6。

³⁶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7。

³⁷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5-1766。

³⁸ 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卷 122，頁 2951。朱子亦同時批評呂祖謙「於經卻不甚理會」，所以其對史的評價未必合理。又據胡玉縉引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中之考證，此書根本不是呂祖謙所著，而是宋末時書肆所編，故云：「《提要》所言，殆皆夢囈。」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頁 527-528。考訂又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頁 264-265。

端緒，而曰可詳其事，其說殊誇。」³⁹、評(明)陳深編之《諸史品節》一書則是：「皆隨意雜鈔，漫無體例。」⁴⁰。評(明)凌迪知所撰之《左國腴詞》更是：「而冗雜破碎，又出《漢雋》之下。」⁴¹(明)王渙所撰之《古今彞語》則是：「其書摘錄《晉書》以下八史瑣語雜事。」⁴²、(明)趙維寰所撰之《讀史快編》是：「是書於諸史之中摘錄其新異之事，始於《史記》，迄《新唐書》，割裂剪裁，漫無義例。」⁴³、(明)陳仁錫編《史品赤函》亦為：「或采其文，或節錄一二事，茫無義例。」⁴⁴四庫館臣認為史鈔之書主要的特點在於對史料能仔細的分類，以便翻查。但如以上書籍，僅純粹摘錄史書之內容，鈔錄者本身沒有一定的標準，或隨意刪鈔，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體例，對歷史的了解並無助益，也非因史文之美文佳句加以鈔錄，所以大加批評。

四、所鈔錄之史事其去取標準不可解抑或評價標準不合傳統價值：史鈔之名的由來即是對史書之鈔錄，在理想上，作者鈔錄時取或不取應有一定標準，但衡諸實事卻並非如此，如(明)唐順之撰有《史纂左編》一書，《總目》謂之：

其意欲取千古興衰治亂之大者，切著其所以然，故其體與他史稍異。然其間詳略去取，實有不可解者。如《君紀》只列漢、唐、宋三朝，偏安者皆不得與，而隗囂、公孫述、李筠、李重進諸人乃反附入。於列代宦官酷吏敘之極詳，固將以垂鑒戒，而唐之楊復恭、來俊臣、周興等尤為

³⁹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7。又《總目》言此書作者陳振孫《書錄解題》及《處州府志》均為「林鉞」，四庫館臣言：「未詳孰是也？」胡玉缙則依瞿鏞等人之記錄，認為《漢雋》之作者應為「林鉞」而非「林越」。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頁 528。

⁴⁰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8。

⁴¹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0。

⁴²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8。

此書作者舊題為(宋)王渙所著，四庫館臣則考訂應為(明)太原之王渙所著。而余嘉錫則考訂此書之作者為明朝長洲王渙之。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375-376。

⁴³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3。又李裕民言：「《四庫》所錄乃殘本。」指出《讀史快編》原書為 60 卷，而非《總目》所言 44 卷。見是氏著《四庫提要訂誤》(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頁 59。

⁴⁴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4。

元惡巨慝，乃反見遺……其他妄為升降，顛倒乖錯之處，不可勝言。殆與李贄之《藏書》狂誕相等。⁴⁵

唐順之的原意本在透過鈔錄史實來呈顯出一個國家的興衰治亂的原因，但從實際內容觀之，此書並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其取材不論是就全面性或適當性來看，都不夠好，更不用說唐順之對史實的判斷與歷來之說有所違戾。四庫館臣不但批評此書的取材體例，其更進一步站在維持傳統道德標準的立場，批評唐順之的歷史判斷，而認為此書並沒有價值。

五、對歷史知識沒有貢獻：史鈔本為鈔錄已存史籍中之文句，本就不能增加我們對於歷史的知識。若史鈔典籍在分類上沒有很好的安排，則其對史學方面並不容易有貢獻。如《總目》說(明)施端教所編之《讀史漢翹》：「卷帙無多，分類繁瑣，殊無益於考證。」⁴⁶而(明)俞文龍所撰之《史異編》則是：「其書以諸史所載災祥神怪匯為一編。既非占驗之書，又無與學問之事，徒見其好怪而已。」⁴⁷這都是從其內容而論，判定這種史鈔書籍並沒有太大的價值。

六、對所鈔錄之內容雖有評論，但沒有任何獨特的見解：此類典籍在史鈔類中是比較特別的，因為《總目》所收史鈔之書籍大多僅為單純擷取史籍部份內容，最多加以分類，作者本身對所鈔錄之史事通常並不加以評斷。但此類史鈔則除了鈔錄史書外，間亦加以說解評論。但《總目》認為這些說解或評論無甚可觀，如對(明)方瀾所撰之《讀書漫筆》一書，言其：「隨筆採摘其字句，兼及訓詁，亦時論斷其是非，發明殊鮮。」⁴⁸言(明)梁夢龍所編之《史要編》為：「《自序》謂學者罕睹全史，是編上下數千載，盛衰得失之跡，大凡具在，蓋為鄉塾無書者設也。」⁴⁹又對(明)穆文熙編之《四史鴻裁》評為：「皆略注字義，無所發明，批點尤為舛陋。」⁵⁰對(明)楊以任《讀史集》一書，四庫館臣說其評語「詞多佻纖」。⁵¹由這些評語來看，此類史鈔不論是就文詞訓詁或史事評點都

⁴⁵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9。

⁴⁶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4。

⁴⁷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6。

⁴⁸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8。

⁴⁹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9。

⁵⁰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1。

⁵¹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4。

是極其淺略的，最多只能當做入門的初階鄉塾教本，並無學術價值。除此以上所舉諸書外，四庫館臣認為某些史鈔中對其他書的批評並不中肯，如：

其發凡譏何氏《語林》濫及稗官。然《世說新語》古來本列小說家，實稗官之流。而責其濫及稗官，是猶責弓人不當為弓，矢人不當為矢也。且所重乎正史者，在於敘興亡，明勸戒，核典章耳。去其大端而責其瑣事，其去稗官亦僅矣。⁵²

四庫館臣認為(明)張墉所撰之《廿一史識餘》中對《語林》的批評即十分不當，因為《世說新語》並非傳統的史書，張墉用史書的標準來評價即不適當。四庫館臣進一步指出《廿一史識餘》在內容亦類《世說新語》，而遠離了正統史書的傳統。

以上六類批評大致是《總目》對於其所收錄於存目的史鈔典籍的評論，由以上的論述裡，可以發現四庫館臣不論對於正式收錄於四庫全書或僅存其目的史鈔類書籍，大約都無甚好評。此類書籍最好的評價僅是因其對史料分類整理，能使讀者快速找到其所欲尋找的史料而已。而明儒所著的眾多史鈔作品裡，四庫館臣根本沒有將任何一本收錄在四庫全書中，由此可見其評價之低。這種對整類書籍評價甚低的情形，在整個《總目》中是極其罕見的。之所以如此，實與史鈔本身性質及《總目》對史鈔一類的界定有關。

三、從分類標準看《總目》對史鈔類評論

整體而論，四庫館臣認為史鈔之書的價值不高的理由及原因，可分為兩點來說：首先、史鈔之書對讀史者來說並非是一種正常的研究方法，其言：「是編采錄諸史《論贊》，以課其子。抄撮之學，非讀史之正法也。」⁵³尤其就主張實學的乾嘉學者而言，當然不會鼓勵這種取巧的讀書方法，⁵⁴所以史鈔的存在價

⁵²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6。

⁵³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二十一史論贊輯要》提要，頁 1775。

⁵⁴ 例如余英時說黃宗義雖「屬於王學的修正派」，但在「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者關係上以「先後」言之，可見當時要求「道問學」的壓力之大。乾嘉之後，則「學者但知有『道問學』而不知有『尊德性』。」見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407-409。

值亦直接受到挑戰。其次，歷代所修之史書本即已對當時所存在的諸多史料進行消化，予以融合成爲一書，其已十分難得。而宋代之後大量出現的「合鈔眾史」式的史鈔，其所面對的是諸多已經自成一格的史書，四庫館臣認爲就算鈔錄者花了很多心力投身其中，最後未必能有好的成果，如其對(清)陳允錫所著之《史緯》之評斷爲：

蓋網羅百代，其事本難。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劉知幾深以爲譏。司馬光《進通鑒表》，亦稱其中牴牾，不能自保。允錫此書，積畢生之力爲之，而卒之不協於體要，固其所矣。⁵⁵

《史緯》一書所述涵蓋的範圍上下千年，四庫館臣認爲陳允錫「用力可謂勤至」。但是其所鈔錄的各朝史書，本來就存在體例不一、記載未協的諸多問題，若想將這些資料直接強合爲一書，自然所用之力多而所得之功少。

四庫館臣之所以對史鈔類評價不高，除了以上兩個史鈔本身特質的問題外，亦實與四庫館臣在《總目》中對史鈔類獨特的界定與區分息息相關。

史鈔類的書籍出現頗早，在《總目》之前的現存相關目錄典籍中，《隋書》、《新唐書》等書多將此類圖書併入「雜史」類。⁵⁶「史鈔」形成一個獨立的圖書分類類別則如前文所述，晁公武提及「前世史部中有史抄類」，又宋初《龍圖閣書目》史傳類或即有分出「史抄」一小類。但現在明確可見的實際分類，則以南宋高似孫的《史略》中明著有「史鈔」一類爲最早。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則將史鈔與史評合爲一類，至《宋史·藝文志》則又以「史鈔」之名取代「史評史鈔」，而《明史》則沿用《宋史》的方式。由這樣的發展看來，史鈔與史評兩類的關係頗深，這兩類在歷史上不同的目錄學家心中或分或合，其內容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從「史鈔」一名的觀點來看，雖然眾多目錄學家都曾使用「史鈔」之名用以做爲史部下書籍的一個小類，但對那些書籍應歸屬於此小類的認定標準則未必一致。《宋史·藝文志》雖有史鈔之名，但其收書標準實是將《總目》的「史鈔」與「史評」之書(甚至是其他史類)收入，也就是說《宋

⁵⁵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7。

⁵⁶ 許世瑛：《中國目錄學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頁 79 及頁 111。順帶一提的是，這並不表示「史鈔」類的書籍至宋朝方才出現，而是從目錄典籍實際的分類情況來說，「史鈔」可能遲至宋朝時才被視爲一種獨立的書類。

史·藝文志》所謂的「史鈔」其實與高似孫、《總目》所謂的「史鈔」標準並不一致，反而近於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史評史鈔」類。

以沿襲《宋史·藝文志》體例的《明史·藝文志》為例，其中歸入的「史鈔」的圖書有「三十四部，一千四十三卷」。⁵⁷若將此書目與《總目》所收錄之「史鈔」類圖書相互對比，發現在《明史》所收 34 部書中，《總目》僅著錄 16 部，另外 18 部則沒有收錄。⁵⁸在《總目》著錄的 16 部中，《總目》將之視為「別史」的有 4 部，歸於「史評」的則有 6 部，仍視為「史鈔」的則僅有 6 部。⁵⁹

若再將《總目》中所著錄於史鈔類存目的明儒 31 部作品與《明史·藝文志》相對比，《明史·藝文志》中則僅著錄其中 9 部。這 9 部中亦屬於「史鈔類」的為 5 部，《明史·藝文志》將張九韶的《元史節要》及唐順之《史纂左編》歸屬於「正史類」，歸凌迪知的《左國腴言》為「類書」，⁶⁰俞文龍的《史異編》則歸入「天文類」。兩相對比，《總目》與《明史·藝文志》在分類上幾有一半是不同的。《明史·藝文志》之所以如此歸類，或是由於《元史節要》、《史纂左編》兩書均鈔節正史，所以將之歸於「正史類」；而《左國腴言》則「所摘皆僅存一二語」，⁶¹為美詞佳句的選集，所以歸為「類書」；至於《史異編》則因將史書中「災祥神怪」之記載合於一書，所以歸入「天文類」。由這樣的對照看來：

⁵⁷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卷 97，頁 2388-2389。

⁵⁸ 張寧的《讀史錄》一書《明史》獨立收錄，而《總目》則附論於張寧《方洲集》中，沒有將其獨立分出，而從四庫館臣寫的提要中亦無法判斷其對此書性質的看法為何，所以不列入以下統計。

⁵⁹ 《明史》「史鈔類」在《總目》中的詳細分類對照表，請參見本文附錄一。本文之所以取《總目》與《明史》相對比，主要是因為《總目》所錄史鈔類書籍大多為明人所著，所以兩者對比較易看出彼此的特點。又以下兩對照表均含《總目》「史鈔類存目」書籍。此外，《明史》與《總目》所著錄之同一書籍其卷數亦或有不同，如張九韶的《元史節要》一書，《總目》言其有 14 卷並懷疑「非九韶原本」(見《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67)，而《明史》則言此書僅有 2 卷。因本文主要在討論「史鈔」的分類標準問題，所以作者、卷數等問題，若非必要，為免繁歧，均不予註明討論。

⁶⁰ 凌迪知的《兩漢雋言》一書，《明史》並無著錄。但《明史》有收錄凌迪知的《文林綺繡》及《文選錦字》、《左國腴詞》及《太史華句》四書。《明史·校勘記》中疑《文林綺繡》為叢書總名，其下有子目五種，除了《文選錦字》、《左國腴詞》及《太史華句》三書名，尚有《兩漢雋言》及《楚騷綺語》兩種。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98，頁 2449 及 2457。若依此說，則《兩漢雋言》在《明史》中與《左國腴詞》同屬於「類書」。

⁶¹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0。

一、《明史·藝文志》所錄「史鈔類」的書籍遠較《總目》所錄為少。二、觀察《明史》與《總目》對收錄之典籍分類標準，《明史》主要是以書籍的內容做為分類原則，而《總目》則是以其內容來源為書籍分標標準。⁶²

經由以上的對比，可以發現《總目》在做「史鈔」類典籍分類時有兩個特點：一、《總目》認為可以歸入「史鈔」類的範圍較《明史·藝文志》更為精確，在《明史·藝文志》中歸入「史鈔」的圖書裡，《總目》以歸入「史評」類為最多，所佔比例幾近一半，而在《明史》、《總目》均將其歸入史鈔的書籍大約僅有 1/4 而已。這個現象代表四庫館臣對於「史鈔」所認定的標準較《明史》為小，當然也與《明史·藝文志》並沒有將「史評」「史鈔」兩者分立有關。二、四庫館臣在做何種書籍可歸入史鈔類圖書判定時，主要並不是以書籍的內容性質做為判定標準，而是以其內容的來源為標準：若書籍之內容來源為鈔錄其他史籍，則不論其內容為何，均歸入「史鈔」一類。而《明史·藝文志》則是以其書的內容為主，若其內容為正史，則歸入「正史類」；若為災異祥瑞等事，則歸入「天文類」。

四庫館臣在分類時是很有自覺用以上兩個特點為標準，如四庫館臣認為凡是品評史書文字或解釋史書中文字、字音之書，不應列入此類：

若倪思《班馬異同》惟品文字，婁機《班馬字類》惟明音訓，及《三國志文類》總匯文章者，則各從本類，不列此門。⁶³

而其在《全史論贊》一書的提要中則言：

此書皆取《論贊》，宜入「史評」，然皆摘錄於諸史，非所自評也。故仍入之「史鈔類」焉。⁶⁴

對史事的評論從性質上來說本應歸入「史評」類而非「史鈔」類，但若鈔史者所鈔錄的是原史書中作者的史評文字，則此書還是應歸入史鈔類，而非史評類。

⁶² 《總目》「史鈔類」在《明史》中的詳細分類對照表，請參見本文附錄二。

⁶³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頁 1761。

⁶⁴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 65，〈史鈔類存目〉，頁 1771。

換言之，史評文字雖由內容來看為「史評」，但因其來源為鈔錄史書，所以在分類上四庫館臣仍認為其為「史鈔」。

如此一來，在四庫館臣的標準下，能夠歸入史鈔圖書即已不多，加上四庫館臣認為此類圖書主要的性質與價值在於「以類相從」、「博取約存，亦資循覽。」⁶⁵由於在書中不能展現作者的個人見解，否則即不會被歸入此類。如此一來，四庫館臣自然對此類書籍沒有好的評價。

四、結語

在以上的論述裡，我們透過「史鈔」類的歷史發展過程、《總目》對「史鈔」書籍評價不佳的原因及《總目》對「史鈔」類的分類原則等不同面向去觀察《總目》對「史鈔」的看法。其結論大約可以歸納成以下三點：

一、從「史鈔」的發展過程來看，「史鈔」一類應在宋朝即已正式成為「史部」下的一個小類。但在發展過程中，「史鈔」類與「史評」類的關係很密切，有些目錄學家將其分為兩類，但也有目錄學者並沒有將這兩類區分開來，而以「史評史鈔」類、「史學」類、「史鈔」類等名來泛指此類的圖書。也就是說僅由「史鈔」之名並不足以界定其圖書性質，而是必須看「史鈔」是否與「史評」、「史學」等名并列，否則容易產生「名同而實異」的誤解。例如《明史·藝文志》所指的「史鈔」類，就其收書內容來看，幾近一半收在《總目》的「史評」類，收在《總目》「史鈔」類的書籍則僅有四分之一。可以說《明史·藝文志》的「史鈔」類性質反而近於《總目》的「史評」類。

二、從《總目》對何種書籍才能列入「史鈔」類的標準來看，其較《明史·藝文志》更加嚴格也更加明確，從名義上來說也更加的「名實相符」。因為「史鈔」從字面意義來看即是對史書的鈔節，《總目》在對書籍做區分時則精確的掌握了這個標準，以來源做為判斷標準而不從內容判斷。歷來對《總目》推崇，不僅止於《總目》的規模宏大與體例完整，從分類的精確度來看，亦超越前人。當然也因為「史鈔」大多只收錄完全鈔節史書的文獻，所以除了因對資料分類而在搜取史籍、史事上有所貢獻外，大多都無有可觀之處。這也形成了《總目》

⁶⁵ (清)紀昀總纂：《總目》，卷65，〈史鈔類存目〉，頁1761。

整體對此類書籍的評價頗低的結果。

三、就更仔細的分類標準而言，《總目》也沒有完全依照其自身的標準。因為如前所言，若一書的內容來源全為鈔節前人史籍，四庫館臣才將此書列為史鈔類，否則《總目》應將之歸於它類。但《總目》本身未必完全依照這個原則，因為在第二節所述《總目》對「存目」類第 6 種批評裡，即是批評作者「發明殊鮮」、「批點尤為舛陋」。但「沒有自己的見解」與「沒有好的見解」可以是兩件事，若依《總目》自身所立下的標準，這些圖書實應歸為「史評」或「雜史」類為宜。當然我們也可以對四庫館臣做出「同情的理解」：可能因為這幾位作者的見解實在太過平凡幼稚，所以四庫館臣將之視為不存在，故將其列在「史鈔」之中。但不論如何，這樣的分類結果不免令人有白璧微瑕之感。

附錄一：

《明史·藝文志》中「史鈔」類典籍在《總目》中分類對照表

作者	書名	《總目》的分類	備註
楊維禎	史義拾遺	史評類存目	
范理	讀史備忘	別史類存目	
陳濟	通鑑綱目集覽	未收	
趙弼	雪航膚見	史評類存目	
李裕	分類史鈔	未收	
呂枬	史約	未收	
許誥	宋元史闡幽	未收	
張寧	讀史錄	未收	附於《方洲集》下
李浩	通鑑斷義	未收	
邵寶	學史	史評類	
王峰	通鑑綱目發微	未收	
張時泰	續通鑑綱目廣義	未收	
卜大有	史學要義	未收	
周山	師資論統	未收	
鄭曉	刪改史論	未收	
柯維騏	史記考要	未收	
王洙	宋元史質	別史類存目	書名四庫作《宋史質》
戴璟	漢唐通鑑品藻	史評類存目	
鍾芳	續古今紀要	未收	

歸有光	讀史纂言	未收	
李維楨	南北史小識	未收	
萬廷言	經世要略	未收	
張之象	太史史例	史評類存目	
徐明勳	史衡	未收	
于慎行	讀史漫錄	史評類存目	
李 贄	藏書	別史類存目	
李 贄	續藏書	別史類存目	
馬惟銘	史書纂略	史鈔類	「馬惟銘」四庫作「馬維銘」
趙惟寰	讀史快編	史鈔類存目	
謝肇淛	史	史鈔類	
吳無奇	史裁	史鈔類	「吳無奇」四庫作「吳士奇」
張 溥	史論二編	史評類存目	書名四庫作《歷代史論二編》
楊以任	讀史四集	史鈔類	書名四庫作《讀史集》
馮尙賢	史學彙編	未收	

附錄二：

《總目》中「史鈔類存目」典籍在《明史·藝文志》中分類對照表
(本表僅列出兩書均有收錄之書籍)

作者	書名	《明史·藝文志》的分類	備註
張九韶	元史節要	正史類	
唐順之	史纂左編	正史類	
凌迪知	左國映詞	類書類	
凌迪知	兩漢雋言	未收	《明史》著錄有凌迪知之《文林綺繡》，而《兩漢雋言》當屬於《文林綺繡》子目。
明馬維	史書纂略	史鈔	
吳士奇	史裁	史鈔	
謝肇淛	史鱗	史鈔	
趙維寰	讀史快編	史鈔	附於《方洲集》下
楊以任	讀史四集	史鈔	《總目》書名作《讀史集》
俞文龍	史異編	天文類	

Criteria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traction — Using *Siku Quanshu Zongmu* as the Core

Te - ming Liu*

Abstract

Bibliography not only records the names of books, it also reflects the kind of academic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Siku Quanshu Zongmu* is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in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extraction” and discusses the forming of the bibliography history and how *Siku Quanshu Zongmu* views it.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i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extraction” in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puts the appraisal on various “historical extraction” of *Siku Quanshu Zongmu* in order. Moreover this paper presents various criticisms the official of Si Ku Quan Shu Hall had of the “historical extraction” in detail. Furthermore, the reasons why *Siku Quanshu Zongmu* devalues ‘historical extraction’ and its criteria for it are also delved into.

Keywords : *Siku Quanshu Zongmu*, Catalogue classification,
Historical extraction, Historical Evaluation

國立中興大學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